

本书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杰出青年教师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 10532069

中国近代文化与五四社团

曲广华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文化与五四社团/曲广华著.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4
ISBN 7-5601-3014-3

I. 中... II. 曲... III. 社会团体—研究—中国—近代
IV. 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057 号

中国近代文化与五四社团

曲广华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黄凤新

封面设计:于双华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黑龙江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张: 11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75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601-3014-3/K·87

定价:22.00 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中国近代文化与近代社团的滥觞.....	(1)
一、“中体西用”论与价值观的革新	(2)
“中体西用”的文化思潮.....	(2)
西学的输入与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新.....	(6)
新式人才与新价值观的萌发	(10)
二、戊戌维新与近代社团的滥觞	(16)
康、梁“新学”的兴起	(16)
戊戌维新与学会之议	(22)
比肩而兴的学会组织	(27)
学会的文化活动与精神	(33)
三、二十世纪初之异质社团	(39)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化	(39)
炽热如火的革命团体	(43)
积诚罄哀的立宪社团	(50)
本章小结	(56)
第二章 五四社团崛起的政治文化氛围	(64)
一 民元后的社会意识与政治	(65)
复古思潮与帝制复辟	(65)
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勃兴	(70)
二、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	(78)
蔡元培早期的教育和革命活动	(78)
北大的改革与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形成	(86)

倡导学术研究与社团活动	(93)
三、新知识群体与民族自决自救意识的亢进	(104)
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104)
民族危机与自决自救意识的亢进	(110)
本章小结	(117)
第三章 五四社团流派面面观	(123)
一、坚定无政府主义信念的社团	(124)
无政府主义的渊流与输入中国	(124)
无政府主义社团览要	(130)
无政府主义社团内部的思想分歧	(138)
二、初步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团	(145)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45)
初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团	(152)
毛泽东与新民学会	(163)
三、“隔着纱窗看晓雾”式的社团	(171)
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	(171)
工读互助团的理论与实践	(178)
钟情于合作主义的社团	(187)
四、倡行教育学术与人格修养的社团	(196)
推崇“教育救国”理论的社团	(196)
遵奉学术研究与砥砺人格的社团	(203)
少年中国学会及其分化	(207)
本章小结	(216)
第四章 五四社团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功能	(227)
一、五四社团的特征概说	(228)
社会改造旗帜下知识分子的聚合	(228)
社团宗旨与运作方式的趋同	(234)
二、五四社团在社会转型期的功能作用	(241)

青年知识群体继往开来的人生预演·····	(241)
科学思想相争而兴·····	(247)
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254)
本章小结·····	(263)
第五章 个案研究——	
民国时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268)
一、职教社成立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	(269)
辛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教育·····	(269)
黄炎培的教育考察活动·····	(272)
中外教育思想的契合·····	(276)
二、职教社的漫漫求索路·····	(281)
“职教救国”理想的阐扬与实践·····	(281)
推行“大职业教育主义”·····	(286)
为抗日民主献策献力·····	(293)
肩负双重的历史重任·····	(296)
放弃改良走向革命·····	(304)
三、职教社之功过评说·····	(309)
“职教救国”思想的新思考·····	(309)
“归队五星旗下”的历史评说·····	(314)
本章小结·····	(321)
附录 ·····	(331)
后记 ·····	(335)

前 言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转型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异常活跃和沸腾的时期。在历史提供的机遇下，广大青年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纷纷集会结社，成立了品牌繁多、异彩纷呈的社团组织，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社团的繁荣兴旺对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成长，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五四时期社团林立的文化现象不是偶发的，更不是人为促就的，它是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新思维与新观念的启蒙，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启了集会结社的先河。这一切都为五四社团提供了新鲜的文化养料和深刻的历史启示，是不可或缺的文化积累。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封建士大夫中产生了“开眼看世界”的先觉者。他们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魄力，打开了中国人万古的心胸。19世纪60~9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即是“师夷制夷”从理念到实践的转换。

“师夷”即意味着向西方学习，“西学”的输入，必然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冲击和挑战。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怎样处理中西方文化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话题。封建士大夫中的开明之士先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尽管不同的人提法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固有的文化为本原，辅以西方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中西方文化发生接触和碰撞时，最先产生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基本符合异质文化碰撞、相识、交流始于器物层面的规律。

正是在“中体西用”文化观念的引领下，中国文化开始由古代向近代迈进。

中国近代文化的内涵与特质迥异于古代文化：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应用于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自然科学知识与学理提高了中国人认识自然世界的能力；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教育改革，培养了具有近代知识的实用人才；以民主与自由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增强了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理性思考和辨析能力；现代传播媒介发挥着去塞开通、聪耳明目的启蒙功能，成为变易社会的“革心”与“革新”的有效工具。这种新质文化无不冲击着中国传统的以纲常礼教为轴心的封建文化，封建传统文化的紧箍咒开始松动了。

随着西学的输入和中国近代文化的生成，促进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产生了面向近代的新意识和新价值观。诸如有些人冲破了“重义轻利”的传统束缚，转而崇尚“商战”和富强之道，由推戴“君权”转而赞美和推崇“议会”政治，向往民主了。这些变化的实质是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的转移，体现的是一种新意识和新价值取向。而在士人风气中变化最显著的则是他们冲出了“君子不党”的桎梏，“合群”救国、“合力”求知的理念，成为进步士人的共识。因此，在戊戌维新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士人结社的第一次高潮，这正是中国近代社团的滥觞。

戊戌维新领袖多次阐发“群则强”的思想理念。梁启超曾指出，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而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他十分明了地论证了“独弱群强”的利害关系。而康有为分析问题更是一针见血，令人折服。他说，中国与欧洲诸国相比，可谓是庞大魁巨，而甲午之役则败之于蕞尔小国日本，其祸在于“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中国若要保国保种，挽救危机，在于“学之群之”，“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智，群则强”。而“共学”与“合群”的途径，则是开学会。为此，康有为首先率其弟子，又联络了部分京城士绅，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学会

之风由此掀起。

在维新派的积极示范和呼吁下，各地学会遍起，万众沸腾，“君子不党”的樊篱已经崩溃了。他们通过集会、办报、办学、译书等活动，传播着维新变法的思想和信息，推动着变法高潮的到来。虽然维新变法百余日即告失败，大多数学会也不复存在，但它的思想文化遗产影响着历史的后来人。

戊戌学会开启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会结社的先河。

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的政治态度，使资产阶级扮演着“革命”与“改良”的不同角色。一边是炽热如火的革命团体，一边是积诚罄哀的立宪社团，他们同时上演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悲喜剧。他们共同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次社团活动的高峰。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中国只改换了朝代，并没有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历史新气象。相反，军阀专制和复古的逆流使华夏上空阴云密布，启蒙与救亡依旧是时代的主题。五四一代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勇敢地走在了历史的前列，担当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主角，奏响了时代的主旋律。

五四时期，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诸多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纷纷成立名目繁多的社团组织，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第三次社团繁荣的高潮。

五四社团产生于中国思想文化界开放的时代。前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中经反帝运动中民族意识的觉醒，强烈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成立社团，则成为他们释放激情，感召世人和领导社会的有力方式。因此，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飘有社团的旗帜与其发出的呐喊，这成为五四时期中国历史上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五四社团继承了前辈社团的“合群”、“合力”思想和某些行动方式，但更多的是它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

首先，五四社团不是谋求某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而是着力宣传某种思想体系和文化理念，因而，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如果对当时数以百计的社团按其思想主张和文化理念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成五类：一是笃信无政府主义的社团。这类社团的数量居全国社团之冠。二是信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这类社团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的某些领导人物一经信奉马克思主义，即终生不渝，为其奋斗，甚至牺牲生命，这是其它社团所不可比拟的。三是兼信和杂糅各种伪社会主义思潮的社团。诸如新村主义、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些伪社会主义思潮杂糅的结果，导致了昙花一现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其结局是悲哀的。四是信守和实行合作主义思想的社团。他们试图通过发展合作事业，和平消灭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五是推崇“教育救国”、发展学术和专门提倡人格修养的社团。这类社团是本着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提高国民意识和人格修养，为中国奠定一个厚重的文化基础而成立的。他们从事的事业，实际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建设工程，在中华民族危机严重的环境里，不投身救亡事业，这种文化工程是很难奏效的。因此，很多这样的社团后期往往都改变了初衷，另谋前途了。

其次，五四社团的成员是单纯的，几乎都是在校的大中专青年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有少部分是中学生，没有官僚政客混杂其间。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总是社会人群中最先觉悟的成分，他们最充满朝气和富有热情，同时，他们也最少有保守思想，最易接受新事物，吸纳新思想。因此，在同一学校或相邻学校的青年学生，在志趣相投与共展宏图的理想驱动下，相约走到了一起，成立了自己的社团组织，当时很多社团就是这样成立起来的。

第三，五四社团具有思想的兼容性与组织的统战性。当时，参加社团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影

响，在他们的信仰中，很少有只单纯地信仰一种思想或一种主张的人。虽然我们按照各社团的思想倾向，把当时社团分成几大类，也主要是按照其思想主流来划分的，而不是纯而又纯的只信仰一种思想。因为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正是百家争鸣的时期，各种思想和主张都各有自己的思想领地和市场份额。这种状况使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无从选择和辨别，因而，他们在各种思潮共涌的海洋中左顾右盼，兼收并蓄。既使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领袖们，如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等人，也都曾对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等思潮发生过兴趣。正是因为有思想的兼容性，有些社团的成员参加了两个以上的社团组织，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跨社团、社团间的合作、以及各小社团成立联合性的大社团，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合作或联合，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社团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历史阶段上的每种社会思潮、每个历史人物、每场群众运动，都能在五四社团中找到它的渊藪。因此，五四社团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发挥的功能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五四社团是各种社会思潮的载体。当时，伴随社团繁荣的另一现象是报刊传媒的发达，绝大多数社团都有自己的喉舌和宣传阵地，各种社会思潮正是这些传媒传播的对象，从而喧腾于众人之口。各种思潮传播的过程，也是探索、争鸣、比较、鉴别的过程，真理会愈辨愈明，伪学说终究会归于沉寂和破产，科学思想会为它的群众开辟道路。所以，各种社会思潮争鸣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掌握，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我们的结论就是：科学思想，恒以相争而兴。

五四社团是各方面人才成长的摇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精英人物，都是五四社团中的活跃分子。在这些精英中，他们或是政党领袖，或是学术大师和专家。前者诸如中国共产党的

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以及那些牺牲的早期领导人，九三学社的领袖许德珩等；后者诸如史学家顾颉刚、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家朱自清、郑振铎、俞平伯，音乐家王光祈等，他们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无论是政党领袖，还是学术大师，共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是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和学术进步的主力军。

五四社团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群众和实践场所。陈独秀举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后，民主与科学即成为了时髦的口号，文学革命也成为了文学领域的新课题。对于新文化，仅有旗手的摇旗呐喊是不会发展成为运动的，旗手的身后应该有他基本的群众，而五四社团则正是他的群众队伍。当时的每个社团都曾标榜以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为旨趣，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是热烈拥护的，特别是对个性解放则情有独衷。在当时各社团所办的刊物中，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主张人格独立和妇女解放，打倒孔家店等内容，随处可见，无不体现对封建传统文化与观念的叛逆；对现代科学知识的介绍也是很多刊物的重头内容。有些社团的成员用白话文创作文学作品，像新潮社即是这样，在这个社团里走出了数位很有名气的文学家。而从当时各社团的刊物来看，只有个别社团使用文言文，其余都是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这本身就是对新文化的有力支持。而社团本身的组织规则和运作模式也无不体现民主的风格。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的口号通过这些社团得以传播和实践，发扬和光大。

对于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社团就是他们踏向社会的第一个人生舞台。通过 这个舞台的锻炼和思索，他们初步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带着梦想（或理想）向八方远航。小社团，大舞台。五四社团对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发挥了“预演人生”的试验场的作用。

五四社团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留给后人的思考是多维的。

今天，正是我们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高潮时期。现代化首先应是人的现代化，是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任何伟大的工程都是由“人”来完成的，是人在某种思想和文化理念的支配下去成就的。所以，人才是关键。如何发挥现代社团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伟大作用，如何认识现代社团和现代化人才培养的关系，都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对五四社团问题的研究将给我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

第一章

中国近代文化与 近代社团的滥觞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工程。洋务派从“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虽然它的主观目的没有实现，但在客观上开辟了中国吸收和引进西方文化的先河。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陆续融进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这一切开启了中国人封建思想的闸门，催发了中国文化及思想观念向着近代文化方向转变：在“中体西用”文化观念的实践中，产生了一批新式人才，伴随其生成的是新价值观；在康、梁“新学”的引导下，维新思潮走向高涨，并促成了近代社团的兴起；在民主革命思潮的勃兴中，革命团体与立宪社团分途扬帆，使资产阶级文化异彩纷呈。凡此种种，无不体现着“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工程已经启动，而这正是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进程迈进的先导和前提。

一 “中体西用”论与价值观的革新

“中体西用”的文化思潮

“中体西用”论是一种文化观念，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语，其核心是以“中学”为根本，以“西学”为辅用，主要是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来维护中国封建主义的“纲常礼教”、“祖宗之法”和“文武之道”。

“中体西用”论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学术见解，而是历史潮流催生的应时的文化观念。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产生了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封建士大夫，他们提倡“经世致用”，研究世界历史与地理。林则徐的《四洲志》与魏源的《海国图志》，成为闭塞的中国人眺望世界大势的窗口，扩开了中国人万古的心胸。尤其是《海国图志》，经世的目的极其鲜明。魏源在该书的“原叙”中郑重指明此书的目的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为此，他在书中广泛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战船、火炮、炸弹、炮车、天文、技艺、自来火铳、水雷等的制造技术和图式，还涉及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海国图志》是较早的引进西方科学知识的著作，具有开启世界知识之蒙的历史作用。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对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就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关系方面而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人从主观上有目的的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始源，也是中国人文化心态开放意识的起点。它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自此以后的开明之士，自觉学习外国先进文明的有识之士，无不受到“师夷制夷”思想观念的启蒙，而洋务运动、

维新运动更有它的历史回声在激荡。作为中国近代认识西方与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潮的兴起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最初的萌动,积极的催发,是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萌芽。

“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打开了中国封建(而且也是封闭的)文化的缺口,一旦接触到西方的“长技”,不可能不接受关于这些“长技”的基础科学。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运动兴起,从其本质上说,这是“师夷长技”从观念到实践的转化,是学习西方“长技”的具体实施。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问题。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开明之士都提出了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新观点,并形成一种文化思潮和基本模式。虽然每个人的具体提法不尽相同,但其核心思想是共同的,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在洋务运动后的几十年间,它成为一种思潮,这是一种新文化思潮。

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文化观念的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冯桂芬。1861年,冯桂芬完成了他的著作《校邠庐抗议》。他在其中的《采西学议》篇里,就道出了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新文化思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对冯桂芬都非常器重,特别是李鸿章对冯评价甚高。冯桂芬去世后,李鸿章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他在《墓志铭》中说:“予至沪,奏辟君自随。君设会防局,调和中外;又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①这足以表明冯李之间的关系。冯桂芬关于中学西学的观念,成为洋务运动中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中体西用”论的雏形。

其后,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都对“中体西用”的话题进行发挥。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变法》篇中言:“今诚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俾西人不敢

蔑视中华”。他是用西学来保卫中华。王韬则用“道”和“器”来阐发中西文化，他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②他还把“道”、“器”纳入到中国传统哲学范畴阐述它们的主从关系，“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③“道”为中学，“器”为西学，前者是“主”，后者是“辅”，所以，在王韬的文化观念中，中西文化的主从关系显而易见。到19世纪的80~90年代，“中体西用”的文化观更趋具体和明朗。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篇里说：“中学其体也，西学之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而最早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的是上海中西书院掌教沈毓桂，他也是《万国公报》的编者。1895年4月，他在《万国公报》第75期上发表《匡时策》，指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年8月，工部尚书兼管官书局的孙家鼐在给皇帝的奏折《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也宣示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堂的办学宗旨：“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④实际上，孙家鼐把当时人们谈论的关于中学西学关系的论点都写了进去，以强调中学与西学的正当位置，后来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也是遵照了这一宗旨。1898年6月，戊戌维新已经走向高潮，光绪帝颁发“诏定国是”，宣谕：“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奋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⑤“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出现在皇帝的谕旨中，已经表明它成为了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一个定则，并诏示了天下。对“中体西用”论进行详细阐发到极至的，是洋务派后期领袖张之洞。1898年5月，他著成《劝学篇》，其中《设学》篇中写道：“新旧兼学，四书五

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其全书四万言，对“中体西用”论述之详，议论之深，超越他人之上。所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张之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的“最乐道”者，为此，很多人就把“中体西用”的口号挂在了张之洞的名下。

在洋务运动兴起后的 30 多年间，阐发“中体西用”论的是几代人，凡喜谈时务、讲求西学之人，莫不接受或附和这一主张。所以，“中体西用”之论出自各类人物之口，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思潮。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是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基本符合中西文化交流规律。

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层面：外层，是物的部分（或外在的部分），诸如科技、物质产品、工艺等科技或物质文化；中层，即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自然和社会的理论、社会组织制度、政治制度等制度文化；核心层，心的部分，即文化的心理状态，包括学术思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伦理、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精神文化。这三个层面彼此相关，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包含了这三个层面，并自成体系。从本质来说，中西文化是异质文化，各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精神内涵，三个层面也具有特质性。但是，当中西文化进行接触和交流时，它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会按客观规律运行。一般情况下，当两种异质文化相逢时，首先容易发现的、而且直观的是物的层面，久之，会渐渐地进入中间层，即理论或制度层面，最后，方能体味到对方的核心层面。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逢、碰撞与交流，也正是遵循了异质